

曲艺丛谈

赵景深

中国曲艺出版社

曲 艺 丛 谈

赵 景 深

中国曲艺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曲 艺 丛 谈

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226,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9.375

1982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1——6000

书号: 10227·019

定价: 0.90 元

序

赵景深先生的《曲艺丛谈》，是他研究我国曲艺论文的首次结集。

远在三十年代初期，景深先生于研究我国古代小说、戏曲的同时，对这类在我国人民生活土壤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曲艺文学、艺术，就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工作。一九三六年，他系统地研究了长期以来流行于我国北方的大鼓，写成第一本曲种专著《大鼓研究》（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即在曲艺学科领域，一直辛勤地整理资料，从事着研究写作。并且，在他接续阿英主编的《通俗文学》周刊的复刊之后，和他自己主编的两种《俗文学》周刊中，刊载曲艺研究的论文，从而使所谓“俗文学”的研究领域放宽，不再仅仅限制在小说、戏曲的范围。解放后，他主要的努力，不仅是对曲艺遗产的描述研究上，而且还用在它们的理论认识上，探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于是又写作了《谈曲艺创作》、《怎样写通俗文艺》等论著，试图用实践来检验真理。

现在这部《曲艺丛谈》所收的论著，就是他以前所写的几种曲艺书和散在杂志报刊的文章经过选编的汇集。这里，我觉得值得学习的地方：

首先，就是他读书博、视野开阔，在文学史的研究历程中，努力于修正传统的狭隘观点、概念和方法，开拓了研究的新领域。如：对于“一向受正统派文人的鄙视”的大鼓，认为是“素朴而富于生命

力的民间文学”，文学史家应“承认其相当的地位”，“正式引入文学史内”。文学艺术学科尽管门类各有不同，但彼此通过基础理论相联系，必定会有交叉的研究领域。因而，他看到曲艺同小说、戏曲的紧密联系，重视了曲艺文学艺术的研究。无疑，这对于探讨我国文学艺术现实主义的生命力以及共同的艺术规律，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其次，就是他在掌握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对历史年代相近、社会形式相似条件下产生的作品，进行了其主题、内容、艺术表现手法上的异同的比较研究，从中探讨文艺发展的延续性和继承性。如：“断定马头调不是寄生草的别名，而是借用了寄生草词句”，“翻调的风气是一脉相承，由来已久的”，“‘节诗’其实就是‘南词’，也就是‘弹词开篇’在绍兴的流派”等见解，都是从比较鉴赏和研究中总结而来。这也是前人很少去作而予我们文学艺术研究工作有启发的。

至于他能在研究工作中总结创作规律，写出了一些曲艺实践的论著，不仅对于曲艺工作者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并且这一努力方向，也应是我们搞科研工作的人所必须学习的。学术研究必然后胜于前，既要继承前辈学者的成绩，还要学习其治学精神、治学方法，汲取精华使之发展。我想，这部论文集的出版，不仅能予曲艺文学艺术的科研工作有一定影响，而且对于我国文学艺术史的深入研究，也会提供有用的参考。作为从事曲艺史研究工作曾得景深先生很多教益却仍旧是个初窥门径的学徒，只能满怀欣忭说这么点感想而已。

关德栋

一九八一年十月

目 次

序	关德栋(1)
谈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	(3)
关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	(11)
《话本小说概论》序	(13)
略谈《霓裳续谱》	(20)
略谈《白雪遗音》	(26)
《夹竹桃顶针千家诗山歌》序	(35)
关于牌子曲	(38)
《弹词选》导言	(40)
弹词考证	(58)
关于《再生缘》的续作者	(117)
谈《苏州评弹旧闻钞》	(120)
从贵州弹词说起	(123)
抗战与弹词	(124)
大鼓研究	(127)
《鼓词选》序言	(176)
关于大鼓	(190)

大鼓书录	(193)
《红楼梦》大鼓	(198)
《儿女英雄传》中的大鼓史料	(201)
大鼓的韵	(203)
从大鼓到蹦蹦	(205)
《五十七勇士》序	(208)
《子弟书丛钞》序	(214)
韩小窗的《滚楼》	(217)
《李闯王评话》和《平鹰坟》	(219)
快书《闹天官》	(221)
北方曲艺形式的革新	(223)
板话的娘家	(225)
四川竹琴《三国志》序	(227)
最早的滩簧	(232)
怎样写通俗文艺	(234)
谈曲艺创作	(278)
我是怎样研究曲艺的(代跋)	(291)

序

赵景深先生的《曲艺丛谈》，是他研究我国曲艺论文的首次结集。

远在三十年代初期，景深先生于研究我国古代小说、戏曲的同时，对这类在我国人民生活土壤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曲艺文学、艺术，就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工作。一九三六年，他系统地研究了长期以来流行于我国北方的大鼓，写成第一本曲种专著《大鼓研究》（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即在曲艺学科领域，一直辛勤地整理资料，从事着研究写作。并且，在他接续阿英主编的《通俗文学》周刊的复刊之后，和他自己主编的两种《俗文学》周刊中，刊载曲艺研究的论文，从而使所谓“俗文学”的研究领域放宽，不再仅仅限制在小说、戏曲的范围。解放后，他主要的努力，不仅是对曲艺遗产的描述研究上，而且还用在它们的理论认识上，探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于是又写作了《谈曲艺创作》、《怎样写通俗文艺》等论著，试图用实践来检验真理。

现在这部《曲艺丛谈》所收的论著，就是他以前所写的几种曲艺书和散在杂志报刊的文章经过选编的汇集。这里，我觉得值得学习的地方：

首先，就是他读书博、视野开阔，在文学史的研究历程中，努力于修正传统的狭隘观点、概念和方法，开拓了研究的新领域。如：对于“一向受正统派文人的鄙视”的大鼓，认为是“素朴而富于生命

力的民间文学”，文学史家应“承认其相当的地位”，“正式引入文学史内”。文学艺术学科尽管门类各有不同，但彼此通过基础理论相联系，必定会有交叉的研究领域。因而，他看到曲艺同小说、戏曲的紧密联系，重视了曲艺文学艺术的研究。无疑，这对于探讨我国文学艺术现实主义的生命力以及共同的艺术规律，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其次，就是他在掌握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对历史年代相近、社会形式相似条件下产生的作品，进行了其主题、内容、艺术表现手法上的异同的比较研究，从中探讨文艺发展的延续性和继承性。如：“断定马头调不是寄生草的别名，而是借用了寄生草词句”，“翻调的风气是一脉相承，由来已久的”，“‘节诗’其实就是‘南词’，也就是‘弹词开篇’在绍兴的流派”等见解，都是从比较鉴赏和研究中总结而来。这也是前人很少去作而予我们文学艺术研究工作有启发的。

至于他能在研究工作中总结创作规律，写出了一些曲艺实践的论著，不仅对于曲艺工作者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并且这一努力方向，也应是我们搞科研工作的人所必须学习的。学术研究必然后胜于前，既要继承前辈学者的成绩，还要学习其治学精神、治学方法，汲取精华使之发展。我想，这部论文集的出版，不仅能予曲艺文学艺术的科研工作有一定影响，而且对于我国文学艺术史的深入研究，也会提供有用的参考。作为从事曲艺史研究工作曾得景深先生很多教益却仍旧是个初窥门径的学徒，只能满怀欣忭说这么点感想而已。

关德栋

一九八一年十月

谈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

一九六七年上海嘉定县城东公社社员在平整土地时，在明代宣姓墓中发现一批明代中叶成化七年至十四年（一四七一至一四七八年）北京永顺堂用竹纸刊印的十一种“说唱词话”和一种南戏《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版框高约十七点五厘米，宽约十一点五厘米。粗黑口，“说”、“唱”、“赞”等字样都用墨围。这在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和唱本发展过程的研究上，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新发现。这是过去中国任何书上从来没有著录过的，值得重视。现此十二种书已由上海博物馆收藏。

这十一种词话原来是一个姓宣的妇人的随葬品。她的丈夫在陕西做官。可能她生前喜欢这些唱本，就由家里人将这些唱本放在棺材里了。其中一种说唱词话，只能看出书名叫做《新编说唱包龙图赵皇亲孙文仪家传》，全书粘连，还未修复。这一种词话，下文就不多提起了。

什么叫做“说唱词话”？我们必须廓清一些容易混淆的概念。《也是园书目》曾将宋人话本如《错斩崔宁》、《冯玉梅团圆》等短篇小说称为“宋人词话”；明代兰陵笑笑生的长篇小说《金瓶梅》也被称为《金瓶梅词话》；这些都不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说唱词话”。我们所说的“词话”是唱本，是鼓词、弹词的祖先。它的形式主要是七字

唱句，有说有唱，有时也有“攒十字”的小段。宋人话本也常插些诗词，那只是作为赞叹或引用古人的诗词，不是以诗词唱句来表达故事情节；《金瓶梅词话》常叙宴饮时乐人歌唱的散套，其中好多曲子都是《雍熙乐府》、《词林摘艳》等书中所记载的，删去这些曲子也无损于故事情节的发展。只有明嘉靖间杨慎拟作的《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在形式上近似我们这里所说的说唱词话，但它只是韵文的通俗历史，而不是叙述故事。直至明末诸圣邻的《大唐秦王词话》才是今天以前惟一的、完整的说唱词话。一九五五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所影印的《大唐秦王词话》出版说明云：“鼓词的底本成为独立的书写文学的作品而在社会上传播，大致始于明末。这部《大唐秦王词话》，有人认为是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鼓词传本。”现在却有成化年间十种说唱词话出现，上面这段话就要改写，上推二百年了。孙楷第所著的《沧州集》曾推测在《水浒传》成书之前，有过《水浒传词话》，这个推测不无道理，可惜到现在还没有发现。因此这新发现的更早二百年的十种说唱词话就更值得重视了。

这十一种说唱词话从来没有听见说起过。在中国封建社会，士大夫一向看不起所谓下里巴人的唱本，劳动人民又没有保存书籍的条件，因此这些唱本就更容易散失和湮没。几十年前四川成都天回山曾经出土过汉灵帝光和七年（一八四年）的说书俑，面容含笑，右手高举鼓槌，左臂抱鼓，跷起右脚，仿佛正在讲唱，神情极为生动。但汉末说书的原词也没有留下来。这五百年前的说唱词话就更为珍贵了。

下面我想将完好的十种“说唱词话”分作讲史三种、公案四种、传奇灵怪三种，逐一略作介绍。

讲史三种中,按照时代次序,讲史第一种是《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传》。这本书分为四集合订一册,即:前集《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后集《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认父传》、续集《新编足本花关索下西川传》以及别集《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贬云南传》。这四集每集十一页,每半页十九行,每行二十一至二十六字不等。前集末有长方木记:“成化戊戌仲春永顺书堂重刊”,戊戌就是成化十四年(一四七八年)。

我们知道,元代《全相平话五种》中,有《七国春秋后集》和《前汉书续集》。郑振铎就很自然地联想起:有后集一定还有前集,有续集一定还有正集(见《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四册第四十八章,第七百页)。倘若按这《花关索传》的例子推论起来,那末,可能《七国春秋》还有“续集”,《前汉书》不仅只有“续集”,还有“前集”和“后集”,而不是“正集”。“续集”只叙到汉文帝为止,下面也许还有“别集”。

《花关索传》是在这批说唱鼓词中最值得注意的,因为它的形式几乎完全同《全相平话五种》一样,每半页上端都有插图,插图约占三分之一,文字约占三分之二。图刻得相当细致生动,刻字的形体风格也同《全相平话五种》一样,每卷的页数也相近。只是那五种是平话,而这种是说唱,文体殊异。因此我颇怀疑这部《花关索传》是从元刊本翻印的,初刻的年代还可以推前一百多年。

《花关索传》上说,花关索是三国时关羽的儿子。关于花关索的记载,已故的王古鲁曾写过一篇《小说琐记》,详细叙述了联辉堂原刊本《三国演义》中关于关索的部分。较早则有平步青的《小栖霞说稗》的“花关索王桃王悦鲍三娘”也可以参考(《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九册一九一至一九二页,并见平步青的《霞外摭屑》九

卷，六五二页）。

除本书上图下文外，其他九种说唱词话，全是图占半页，每种图三幅到十三幅。

讲史第二种是《新刊全相唐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三十页，半页十三行，每行二十一至二十三字，半页插图十三幅，封面上端横刻“北京新刊”四字。卷末有“成化辛卯永顺堂刊”一行字。辛卯是成化七年（一四七一年）。

拿这本书同赵万里从《永乐大典》第五二四四卷“辽”字韵辑出的《薛仁贵征辽事略》对照，发现两书开端几行文字，几乎完全相同，看来说唱词话是根据“评话”改编的唐统治者对外侵略的故事（赵万里认为这评话可能是《永乐大典》所收二十六卷宋元评话当中的）。

讲史第三种是《新编说唱全相石郎驸马传》，二十五页，半页十四行，每行二十一至二十三字，卷末有“成化七年仲夏永顺堂新刊”一行字，成化七年就是一四七一年。

这一种的故事情节与《残唐五代》第四十五回“潞王夺位争天下”直到“石敬瑭长安即位”共六回情节几乎完全相同。以前我以为罗贯中等的《水浒》写得光彩夺目，《说唐》、《残唐五代》之类的书未必是罗贯中写的。现在从这一种说唱词话来推论，至少《残唐五代》在明代永乐年间就已经有了，或许更古一些，有写作于元末明初的可能。罗贯中《水浒》或许是一种失传的简本；繁本的光采是经过好几位名手扩充和润饰过的。罗贯中的杂剧《风云会》并不太高明。《说唐》和《残唐五代》的简朴，可能正是罗贯中的手笔。

郑振铎悬想《全相平话五种》全书似乎不止这几种。“继于《三国志》之后的，或当更有《隋唐志传》、《五代平话》、《南北宋志传》一类的东西吧？”那末，明代成化年的隋唐故事《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以及五代故事《石郎驸马传》或许竟是从未发现的元至治时别

的刊本《全相平话》某些部分沿袭而来的吧？

其次要谈公案四种，这四种说唱词话都是包龙图审案的故事（倘若连已损坏的《新编说唱包龙图赵皇亲孙文仪案传》也算在一起，那就有五种包龙图的故事了）。

公案第一种是《新刊全相说唱包待制出身传》十三页，刻在一起的还有《新刊全相说唱包龙图陈州粳米记》十八页和《新刊全相说唱足本仁宗认母传》十九页。这三个故事都是半页十三行，每行二十一至二十四字，半页插图五幅。这三个故事都是看过元曲《抱妆盒》和章回小说的人耳熟能详的，我无须多加说明了。我认为四种中当以此种的第一部分来源最古，因为此书称包拯为包待制，这是元曲的习惯称呼，而称包龙图是较后的；这里第二部分也用了“包龙图”的称呼，可以看出两个时代的交替。

公案第二种是《新刊说唱包龙图断曹国舅公案传》，四十三页，半页十三行，每行二十一至二十二字，插图十二幅。情节与明代传奇《袁文正还魂记》相似。传说中的包拯是不畏权势的，所以在他的案下，皇亲国戚，每每与庶人同罪。损坏了的成化年间另一种公案词话《包龙图赵皇亲孙文仪案传》也是写的皇亲做案的事。

公案第三种《新编说唱包龙图断歪乌盆传》三十页，半页十四行，每行二十一至二十三字，半页插图六幅，书末有阴文牌记“成化壬辰岁季秋书林永顺堂刊行”一行。壬辰就是成化八年（一四七二年）。封面书名分作两行，其中夹刻“全相说唱词话”一行。这是包拯显赫的传说。词话的人名与别的记载不同：主角，元曲《盆儿鬼》作杨国用，《包公案》作李浩，京剧作刘世昌，词话却是杨宗富；谋财害命者，元曲作客店主盆儿赵，《包公案》作贼人丁千、丁万，京剧作赵大，词话却是耿婆店里的耿一耿。

公案第四种《新编说唱包龙图断白虎精传》是公案第四种中最短的，仅十四页，半页十三行，每行十九至二十二字，半页插图三

幅。封面书名分作两行，其中夹刻“永顺书堂新刊”。情节大意是白虎精变成美女来诱惑在张观主观中借宿的赶考士子沈元华，想趁机吃掉他。结果是：“虎精吃了张观主，龙图勾到斩其身。”

词话《仁宗认母传》中叙包公断案云：“山里大虫勾来到，古窑曾断歪乌盆，街头曾救林招得，法场斩了曹皇亲。”大约就是说的《包龙图断白虎精传》、《包龙图断歪乌盆传》以及《包龙图断曹国舅公案传》之类的事了。

下面要谈传奇、灵怪三种：

传奇、灵怪第一种是《新刊全相说唱开宗义富贵孝义传》。此书上、下卷共二十四页，半页十三行，每行十九至二十二字，半页插图六幅。上卷末有“成化丁酉永顺书坊印行”字样。丁酉就是成化十三年（一四七七年）。

这是一种宣传因果报应的劝善的书，叙开宗义家里豪富，十七个儿子和孙儿们都孝顺他。他有两扇门是无价之宝，还有别的许多珍宝。皇帝用尽计谋，强迫他献出珍宝和两扇门。最后开宗义成了正果。

有一种抄本《忠孝情义开公传》，情节与成化年间的这本说唱词话相似。

传奇、灵怪第二种是《新刊全相鸛哥孝义传》，十九页，半页十二行，每行二十一至二十二字，半页插图十幅。封面上端横刻“永顺堂新镌（刊）”，封面标题分作两行，中央夹刻“新刻说唱足本词话”一行。

这也是一种劝善的书，内容与今传《鸛哥宝卷》略同，只是佛教气息没有宝卷浓厚。大意云：小鸛哥的母亲想吃荔枝（宝卷作櫻桃），小鸛哥孝顺父母，到远方去寻觅荔枝，被人捉住放在笼中，小鸛哥想念母亲，终于逃回。李世瑜编的《宝卷综录》六十一页和七十八页著录《鸛儿宝卷》，一名《鸛哥孝母宝卷》或《鸛哥宝卷》。

传奇、灵怪第三种是《新刻全相说唱张文贵传》，上、下卷共三十五页，半页十三行，每行二十一至二十四字。这故事比较陌生，其中有张文贵赶考，投宿客店，与店主杨都知饮酒，店主为了谋取三件宝贝，绞死张文贵等情节。《福建戏曲传统剧目索引》第五册一三三页有莆仙戏《张文贵》的梗概，与说唱词话《张文贵传》略同。

三

成化年间的十种说唱词话的价值在于：它是说唱文学较古老的刊本。我们可以通过它看到中国古代戏曲、说唱文学和小说相继的发展过程；从而更加了解几百年前元明间的“词话”究竟是什么。

这十种说唱词话颇多迷信荒诞，不仅传奇、灵怪三种是如此，公案四种，甚至讲史三种中也触目皆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六篇对于成化年间的情况以及其时的志怪小说有过十分精辟的分析：“成化时有方士李孜、释继晓，……皆以方伎杂流拜官，荣华耀耀，世所企羨，则妖妄之说自盛，而影响且及于文章。且历来三教之争，都无解决，互相容受，乃曰‘同源’，所谓义利邪正善恶是非真妄诸端，皆混而又析了，统于二元，……其在小说，则明初之《平妖传》已开其先，而继起之作尤伙。凡所敷叙，又非宋以来造作之谈，但为人民间巷间意，芜杂浅陋，率无可观。然其力之及于人心者甚大，又或有文人起而结集润色之，则亦为鸿篇巨制之胚胎也。”鲁迅的最后几句话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十种说唱词话的价值所在。

成化间说唱词话十种的书名中，有九种最末用了“传”字，因此“词话”有时又称作“词传”，《新刊全相石郎驸马传》题目双行当中就夹了一行“说唱词话传”。这在《元典章》五十七卷刑部十九杂禁中也可以看到：“至元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书兵刑部承奉中书

省札付,据大司农司呈,河北河南道巡行劝农官申:顺天路束鹿县头店,见人家内聚约百人,自搬‘词传’,动乐饮酒。为此本县官司取讫社长田秀井、田拗驴等各人招伏,不合纵令侄男等攒钱置面戏等物,量情断罪外,本司看详除系籍正色乐人外,其余农民、市户、良家子弟若有不务本业,司学散乐般说‘词话’人等,并行禁约,是为长便。”这一资料反映了元代村镇中演唱词话的真实情况,可见说唱词话在元代已经是流传广远。明成化年间想来也曾遭到被禁的厄运。

南戏《白兔记》,我想以后另作介绍。

这十种说唱词话刻本的价值远不止此,它还提供了版画史和简化字体研究的材料。例如版画,我国宋、元时代书籍的插图版画,大抵是上图下文的形式,到了明代,才采用半幅或全幅(半页)插图,而内容也主要表现人物故事,画风也变工致为粗豪大笔。这种插图,多见于明万历刻本中。因此,过去人们据以认为插图版画的这种形式和画风,在万历时才形成;这批说唱词话刊本全幅插图的发现,表明了至迟在成化年间,就已经形成了。

一九七二年

刊北京《文物》